

10

日本及其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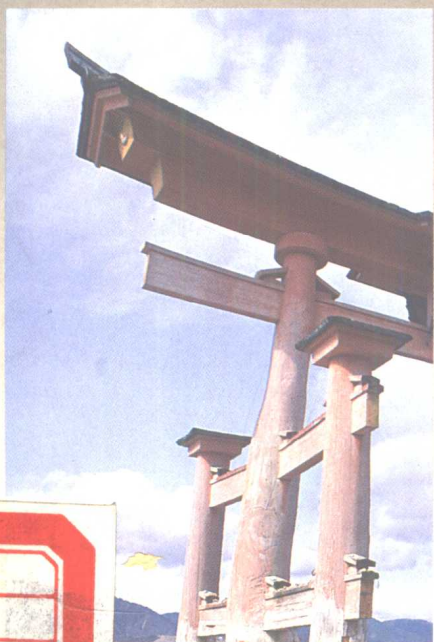
M. B. Jansen

4.324

9

20

商務印書館



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

M. B. Jansen 著

柳立言譯

商務印書館



Japan and Its World :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

Marius B. Jansen 著 柳立言譯

商務印書館

日本及其世界：一百年的轉變

M. B. Jansen 著

柳立言譯

商務印書館

20
010

日本及其世界

M. B. Jansen 著

柳立言譯



Japan and Its World: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

作 者——Marius B. Jansen

譯 者——柳立言

責任編輯——曾越麟 江先聲

出 版 者——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銅魚涌芬尼街2號D僑英大廈五樓

印 刷 者——中華商務聯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75號

版 次——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198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7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ISBN 962 07 5061 6

Japan and Its World :
Two Centuries of Change

日本及其世界：二百年的轉變

前 言

在“布朗與哈利講座”(Brown and Haley Lectures)設立二十五年來，我總是認為，講座委員會是會邀請我的朋友馬里厄斯·詹森(Marius Jansen)發表演講的。

馬里厄斯也是普吉特海峽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已故歷史教授萊爾·謝爾邁廷(Lyle S. Shelmidine)的好友。謝爾邁廷教授同我父親和我一起，為設立這個講座盡過力，而且他還擔任講座委員會主席，直到一九六六年逝世為止。

因此當我見到發表的演講都短小精悍，我感到非常自豪；此外，我還得說明，這些演講實在完美地體現了講座成立之初我們規定的幾項標準：(1)應“由一位從事社會研究或人文科學工作的傑出學者”來演講；(2)演講應“以明快的態度……針對目前社會的要緊問題”；由於出版也是

計劃的一部分，所以(3)演講要包含未發表過的新資料，以期收到增進知識的實效。

布朗與哈利講座委員會主席弗雷德·哈利

(Fred T. Haley)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

序

值此美國慶祝立國二百週年之際，我們正好乘此良機回顧日本二百年來的變遷。二百年前，日本是一個不發達的、與外部世界隔絕的小國。一百年後，它決定根據西方模式改革制度，乃派遣居於領導層的大批精英分子廣游西方，考察使各國富強的各種因素。爲了表示近代化和國際化的意向，日本參加了一八七六年費城世紀博覽會（The Philadelphia Centennial Exposition）。陳列的展品給人深刻的印象，而且展覽的規模和令人感興趣的程度，幾乎沒有哪個參加國可以相比。那樣優越的展覽品，使一位作家承認：“我們慣於認爲日本是沒有文明的國家，或充其量只是半文明的國家。但我們卻在這裏發現充分的證據，證明日本閃耀的藝術光輝使歐洲最開化的國家也黯然失色。而歐洲國家是以藝術爲驕傲和光榮的。認爲藝術是自己高度文明的一個最值得驕

傲的象徵。”^①現在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慘敗後三十年，而日本又成為世界上的大國之一，也是少數工業化的民主國家之一。

在這二百年間，日本的世界觀（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急劇轉變，是不足為奇的，問題將在本書中集中討論。日本從孤立中崛起，成為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國家，這對世界歷史、尤其是美國歷史，影響至大。在二十世紀，這一轉變因日美雙方的誤解和各自的錯誤而玷污了，也被暴力戰爭打斷了。美國也跟日本一樣，在這同一時期成為了世界上的重要國家，美國對國際社會的看法，轉變之巨，是不亞於日本的。

美國對日本的想法尤其反覆轉變得厲害。在我國圖書館的書架上，敘述日本友好迷人而且富

①引文見尼爾·哈里斯（Neil Harris）文：《世界是個大熔爐嗎？日本在美國的博覽會上，1876—1904》（All The World a Melting Pot? Japan at American Fair, 1876—1904），收錄於入江明（Akiru Iriye）編：《共同的形象：美—日關係論文選》（*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坎希里奇，哈佛大學出版社，1975年版，第30頁。

有異國風情的圖書，和那些要提醒人日本是侵略成性、粗暴易怒和不可信任的敵人的圖書並排擺在一塊。大戰以後，日本實施軍事攻擊的危險性已經被淡忘了，不時一再出現的警告都不過是說日本是個勤奮、沒有幽默感和技藝驚人的經濟對手。預言家也逐漸改變腔調，從強調日本喪失了對大陸和殖民地的控制則注定窮困，到強調日本靠勤儉也能生存，之後，再強調日本靠其經濟不斷繁榮興旺，總有一天能雄霸天下。戰後對這個新超級大國的種種稱呼，混雜着樂觀和沮喪情緒，見諸隱喻影射，就有例如以花朵盛開來暗示其脆弱性的。所以對於日本人自己從心情愉快一變而為意志消沉，也不必大驚小怪。

不過，日本人的世界觀在思想和心理兩方面有其深遠的歷史根源，這是新聞記者和空談家所始料不及的；這些歷史上的思想和心理因素多年來成為我的研究的中心。我以為這些因素對了解近代日本和近代東亞是愈來愈重要的。直到近代，在日本人眼中，世界是分成等級的，他們傾向於把世界各國按其各自的地位和重要性來排列，這無疑是源於他們本身的社會結構和經驗。我在下面幾個演講中利用一些特別令人感興趣的

人物的事業和觀點，去探討這個等級排列的變遷。近年來，大量書刊和論著問世，使我尤其感到要用這種研究方法來進行集中討論。不過，循這樣的途徑對日本進行研究，尚屬初創階段，我希望我的論述能引起人們注意這種研究方法的價值及其可行性。

本書是一部講稿，但增補了一些事實、統計數字和篇目，以適應新近的發展和出版要求。

馬里厄斯·詹森
於普林斯頓，1979年

中文版序

本書的內容由三篇演講組成。這三篇演講是在十年前美國二百週年國慶時發表的。那時我正想藉國慶慶典的良機回顧一下二百年間事物變遷的情況，適值普吉特海峽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的朋友要求我以日本作為“布朗與哈利講座”（The Brown and Haley Lectures）的題目，我於是就決定了以二百週年國慶的精神來探討日本的世界觀在過去兩個世紀的變化。就我看來，日本在十八世紀從中國的巨大影響下脫穎而出，進入十九世紀，經過一連串全面改革，力求在國力和經濟上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到目前日本強大的經濟力量和生產率已取代了過去的政治和軍事勢力。

為突出重點，我盡所能在以下三個時期——一七七〇年代、一八七〇年代和現代——各選出一位中心人物，他們的功業和生涯足以作為他們

各自時代意識的縮影。這幾位選出的人物當然不是“代表性的”，因為他們在當時並沒有清醒地意識到臨近的變革；然而，他們都察覺到自己所參與的變革，而且，他們也曾推動和加速這些變革；他們在年老的時候，可以檢討他們有生之年所目擊的變革。我選擇的一七七〇年代的人物是日本學習西方醫學的先驅杉田玄白醫生，他在五十年後撰寫的回憶錄，把他那個時代日本翻譯西方著作日益增長的傾向和一千多年前日本漢學勃興的情況作了比較。一八七〇年代我選中了久米邦武，他是出使西方國家的岩倉使團的書記官。該使團引人注目地長期遊歷西方，因為政府領導人想探求西方國家國力和組織上的秘密，為日本未來選擇合適的制度做準備。久米也很長壽，他在半個世紀後口述撰寫回憶錄時，目睹了大英帝國的沒落。諷刺的是，他本人卻成為被日本社會視為正統的新神道民族主義猜忌下的犧牲者。替一九七〇年代選擇象徵性的人物加倍困難，因為日本由軍國主義走向商業的和平主義的不規則進程尚在進行。我所選擇的人物是松本重治，他曾從事新聞工作，評論工作，及至成為國際機構的主持人。他的回憶錄《上海時代》和新近問世的

《近衛時代》，詳細披露了從未披露的史實。

在美國立國的二百年間，世界各國都經歷了驚人的變化，日本當然並不是唯一曾面對經歷百年大變世界的國家。但我以為這三個演講可以說明日本人不不論是個人或集體，對這些重要的變化認識並作出反應的速度是不尋常的，我之選擇杉田玄白和久米邦武作為中心人物就是要把這點闡釋明白。我想，有一天對中國提出同樣的問題接着使用同樣的方法，才令人感興趣。例如可以把十八世紀時麥卡特尼勳爵（Lord Macartney）謁見乾隆皇帝、郭嵩燾出使西方或者王韜留學外國作為對照。乾隆給英國的著名答覆——中國並不需要任何英國產品和根本不用“奇巧之物”——當然是帶有點誇張的官腔。不難想象，當德川將軍同樣遇上一個新來的外國商人要求正式通商時，也會同樣輕易作出傲慢的答覆。但兩者之間重要的區別在於，清朝皇帝雖然未曾正式與西方“隔絕”，但無所作為，並不像日本人那樣利用長崎的荷蘭人駐地有系統地吸取西方知識，而且中國也沒有像日本個別知識分子那樣着迷於西方知識及其運用的人。在十九世紀當日人到西方詳細考察時，中國人也來到西方。但可以想象，此中

的巨大區別莫過於：明治時代的政府高層領導人幾乎半數親身周遊世界，使自己了解日本進行制度現代化時會遇到的各種大小問題，而相形之下，中國人離開國內的權位，則有招惹猜疑或不務正業之嫌的風險。直到二十世紀，區別仍然存在。日本在戰爭與戰敗的十多年間誠然與世界大勢脫節，但一旦遊歷和觀察的機會重現時，明治時代的範例也就再次出現，隨而大量引進知識與技術，使偏處一方的日本轉變為一個世界性的經濟大國。相反，中國卻退出國際市場，放棄西方技術，尋求自給自足與實行本土主義。當美國在一九七六年慶祝建國二百週年時，中國這種可怕的行動已成強弩之末。在一九八〇年代，這兩個重要的東亞國家首次在平等與合作的基礎上進行商談和貿易，一個真正放目於國際的世界觀也許終會形成。

上述情況只不過預示將來可能有更全面的變化。如果這幾個講演能夠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事情和挑戰提供參考資料，我之所得將極其豐碩。我對柳立言君承擔本書的中文翻譯深表謝意。我從一九五〇年代初開始研究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以來，中日關係一直是我的學術研究主題，我盼望

看到中國讀者對這本小書的反應。

馬里厄斯·詹森

於普林斯頓大學

1986年5月

目 錄

前言	i
序	iii
中文版序	vii
第一講 一七七〇年代對儒家秩序的挑戰	1
1. 中國的巨影	
2. 德川思想裏的中國	
3. 摒絕“中國”	
4. 西方模式的出現	
第二講 廣求宇內知識	35
1. 德川末期	
2. 一八七〇年代的使節	
3. 新日本主義	